

評林滿紅〈世界經濟與近代中國農業—— 清人汪輝祖一段乾隆糧價記述之解析〉一文

岸本美緒*

編者按：日本學者岸本美緒教授近著《清代中國の物價と經濟變動》曾對本所研究員林滿紅女士所作〈世界經濟與近代中國農業——清人汪輝祖一段乾隆糧價記述之解析〉一文提出若干評論，1997 年 4 月間林女士曾就此致函加以答覆，10 月中旬，復接獲岸本教授來函再加補充，林女士也再度提出說明。由於這些討論對釐清十八世紀中國經濟的本質有所助益，故本刊鼓勵兩位學者將雙方論學信札整理為文，一併刊出。

有勞林滿紅教授對拙著《清代中國の物價と經濟變動》中有關十八世紀中葉經濟動向部分詳細的指正，敝人在此向林教授致上深忱的謝意。這個討論基本上是以林教授的大作〈世界經濟與近代中國農業——清人汪輝祖一段乾隆糧價記述之解析〉（以下簡稱「汪文」）作為前提。我對該文整體的旨趣及方法，表示由衷的贊同。即如該文論述所指出，將清代中國經濟的動向和世界經濟的律動加以緊密關聯的思考架構。這即使在本人的拙著中也尚未充分的強調。又如該文中所言，在論述當時的經濟動向時，不能只是就當時的數值加以評斷，也應該考察當時人們如汪輝祖等之思考方式，瞭解其關聯性，諸如此等的方法都非常富有啟發性。

*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本文原為日文，由李季樺小姐中譯。

接下來要當作問題討論的，僅就「汪文」中的部分論點，即乾隆一朝六十年間，是否可以以 1775 年為分界點，將其劃分為經濟困難的前期，和經濟景氣的後期。而在論述前後期之間的物價動向、人口增加率、銀流通量等時，汪文所提及之變化是否可以得證？實際上就這點而言，敝人已在 1979 年的拙稿〈清代前期江南の物價動向〉（已收錄拙著中）言及，「或者說乾隆年間前半期的昂貴主要是以人口增加為主因所導致以穀物為主的昂貴。乾隆中期以後的昂貴主要是以貨幣流通量的增大為起因所導致的一般物價的昂貴。雖然這樣的假設，有可能也說不定。但是，在現在沒有辦法得到除了米穀和生絲以外，其他商品在物價上漲時期的詳細資料的情況下，從片斷的資料中沒有辦法判斷，只好容俟以後再考。」這時，敝人其實和林教授所論有同樣的考慮，但是受到林教授大作的觸發，在再思考的過程中，敝人仍然認為，至少就現在可以利用的資料看來，以 1775 年作分界點等如上述的變化仍然沒有辦法論證。以下就先前林教授所提出的論點，加以應答，略述己見。

一、物價動向——有關林氏在 A 期維生物資特別昂貴， B 期物價則全盤上漲說法的檢討

首先，就在汪輝祖的《病榻夢痕錄》乾隆五十九年的條文中所述「夏間米一斗錢三百三、四十文，往時米價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餓殍，今米常貴而人尚樂生。蓋往年專貴在米，今則魚蝦蔬果，無一不貴，故小販村農俱可餬口」的解釋開始。在這裡所說的往年，正確的時間是指什麼時候呢？又如林氏也引用的，同書乾隆五十七年的條文裡「是年食米一斗，制錢二百八、九十至三百餘文不等。憶十餘歲時，米價斗九十或一百文，間至一百二十文，即共訝其貴。乾隆十三年，價至一百六十文，草根樹皮俱盡。地中產土如粉，人掘以資生。名曰觀音粉，有食之至死者。十餘年來，此為常價，或斗二百錢則以為賤矣」的記載。在五十九年的條文中有所謂「米價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餓殍」的語句，這恰好和他記憶裡的乾隆十三年的狀況是一致的。問題是如果回顧「往年專貴在米」的狀況的話，這是指乾隆十三年特別飢荒

的那一年，還是指 A 期全盤的情形？據敝人的私見，應該是前者。雖然有點冗長，但筆者現仍就汪輝祖的指稱粗略的加以解釋，說明如下：「以前米價賤（例如乾隆十三年那樣），所以米價一到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餓死者。

（和那比起來），現在米常貴（超過一百五、六十文的程度）人們仍樂其生計，蓋往年（飢饉時，例如乾隆十三年，米價至一百五、六十文時），主要是米在貴，但因為現在是日用物資的物價也全都上漲（所以即使米價遠超過一百五、六十文，卻也和乾隆十三年等的飢饉不同），人們仍然可以生活」。在汪輝祖的腦海裡，對因飢饉而有人餓死的乾隆十三年，有非常鮮明深刻的記憶。他在五十九年的條文中所問及的是：雖然現在的物價比那時候要貴，但是為什麼生活反而較安定？如「汪文」表一中所顯示，透過 A 期四十年間來看，蕭山的米價超過二兩（換算成銅錢為一百四十文左右）的情形只有六次。其中有四次是在乾隆三十年代。除此之外，未滿一兩的有兩次，一兩以上未滿一兩五錢的有二十次，一兩五錢以上未滿二兩的有十二次。而關於 A 期中沒有看到米價顯著上漲的平常年份，在汪輝祖五十九年的條述中，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他並沒有特別說什麼。

其次，在 A 期整個期間內，一般而言只有維生物資是特別昂貴的，這樣的說法可以成立嗎？對拙稿中舉出的幾個顯示一般物價昂貴的例子（「至近日，米薪布帛諸食用物價，三倍於前」（黃印）、「物競價而米亦昂」（蔡顯））而言，林氏認為「前者所指稱的仍為維生物資，而後者蔡顯的說法則更強調米價昂貴的情形」。雖然「維生物資」的定義成為一個問題，但若要指汪輝祖所舉的「魚蝦蔬果」不是維生物資，「米薪布帛諸食用物價」為維生物資這樣來作區別的話，也還是很難的吧。又如絲價的上漲，林氏認為「惟此時人口增加引致絲價的上漲，仍不足以證明每人平均所得的增加」。但是，即使想用數值性方式來證明當時「每人平均所得增加」這也是沒有辦法的。我只是認為 A 期物價的上漲不是只有「維生物資」特別昂貴。而就這個意義來考慮，僅能說生絲價格的上漲，可成為一個證據。

維生物資以外的物價，在當時是否停滯，沒有變化，對此的積極性證據（除了上述汪輝祖已言明的之外）因為到現在仍被認為不可得，至少就所謂

「維生物資特別昂貴」的論點，現在仍沒有辦法被充分的立證。相反的，所謂維生物資以外的物價也昂貴這樣的主張雖然也不能說有十分的根據，但是就黃印、蔡顯等的說詞和生絲昂貴的情形，都可以說是對一般物價昂貴說的有利證據。

生絲是否也可以列入「維生物資」這問題姑且不論，下面我試著檢討其他一般奢侈品市場的動向。

乾隆中期以後的奢侈風氣是從來研究者所注目（則松、稻田）。其中的一份史料即是黃印《錫金識小錄》卷一的〈風俗變遷〉一文。黃印在書中到處都指出當地人們貧困化的情形，這雖然似乎支持了林說中 A 期的狀況，但值得注意的是：黃印認為那時的貧困是由於當時奢侈化的風潮。據他說：予所見之四、五十年間，風俗大變。康熙年間穿棉布衣服是很平常的，但是「今則以布爲恥，綾緞綢紗爭爲新色新樣。……間有老成不改布素者，則皆指目而訕笑之。冬月富者服狐裘猞猁狲之屬，服貂者亦間有之。若羊裘則爲貧者之服」。在載有 1765 年自序的龔煥《巢林筆談》卷五〈吳俗奢靡日盛〉中，有以下的敘述。「吳俗奢靡爲天下最，日盛一日而不知反，安望家給人足乎。予少時，見士人僅僅穿裘，今則里巷婦孺皆裘矣。大紅線頂十得一、二，今則十八、九矣。家無擔石之儲，恥穿布素矣。團龍立龍之飾，泥金剪金之衣，編斗僭之矣。飲饌則席費千錢而不爲豐，長夜流湎而不知醉矣。物愈貴，力愈艱，增華者越無厭心，其何以堪」。在這裡所指的「物愈貴」中，由文脈來看，似乎包括奢侈品。又，於 1752 年歿去的常熟舉人陳祖范述及「聞諸故老，享賓二品四品而已。今以陳饋八簋爲常供。器加大，味加珍。衣服多布葛，冬寒絕少裘者。今必出重裘以爲觀美。餘時非羅綺不御矣。往時履襪之屬，出女紅。今率買諸市肆矣。往時茶坊酒肆無多家。販脂膏脯者恒慮不售。今則遍滿街巷，旦旦陳列，暮輒罄盡矣。往時非貴顯不乘軒。今則肩輿塞路矣，酒歌畫舫日益增，倡優之技日益眾。婚娶攝盛之儀日益泰，爲土稚桂魄諸譁囂之物，日益巧，隙地皆構屋，官河爲陽溝，而琴川故跡益湮，凡此物豈非人民富庶之效哉」（乾隆《常昭合志》卷一）。有關指出 A 期奢侈風潮的事例，無暇枚舉。在這些論者中，雖然很多人憂慮如此奢侈所導致的貧困

化，但這未必可以得證林說中 A 期經濟困難的情形吧！因為受到收入減少和米價昂貴夾擊的人們走向奢侈的情形，雖然沒有辦法完全說不可能，但是是很難想像的。又從乾隆末期的人們眼裡看來，乾隆前半的風俗，相對的是較素樸的，強調這點的文章屢屢皆是。當然我也認為乾隆後半的奢侈應較前半更為顯著，但若將 A 期作前後時期的比較，我認為沒有辦法特別說 A 期是平均所得已減少的經濟困難期。

最後談到，當時「每人平均所得」是減少還是增加。根據黃印的說法，城市的人們因為如此的奢侈導致貧困，而另方面，鄉村在這時期溫飽的人卻很多。如拙著 401 頁所引用，他有如下的敘述：「城居者多貧室，有宿春十不得一。而鄉民頗多溫飽。蓋雍正間，彙追舊欠，奉行不善，凡係舊家大抵皆破。至近日米薪布帛諸食用物價，三倍於前，而鮮衣美食之風，日甚一日，又罕習恒業，多博飲遊俠，夫安得不貧。至鄉民，淳厚雖不如前，而力田之勤，則前此所未逮，遇旱澇，前多畏難中輟，今則竭力營救，且有因凶年免租而起家者。又居處村僻，服食簡省，苟安分不賭博，便易致贏餘。」林氏也認定有關 A 期的「地方經濟成長」，據林氏所言「『汪文』強調的是因 $P \uparrow > M \uparrow$ ，長程貿易成長緩慢，導致地方經濟成長仍不夠扶養人口，結果使維生物資特別昂貴，以致糧荒時起」。當時「地方經濟成長」儘管有農民的「力田之勤」但仍不足以滿足當時的需要，而引起食糧不足問題，這點敝人同意，問題是可否看到在 A 期所得的增大和伴隨其而來有效需求的增大。或是相反的可以看到所得的減少和有效需求的減少這點吧！黃印雖然指出城市的人們貧困化的現象，但根據他的說法，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與其說是收入減少，無如說是雍正期的徵稅政策和乾隆初期行之過熱的消費熱潮的緣故。他對農村的情況則指出有勤勞意願的增強、儲蓄盈餘、生活水準提高等現象。雖然不能以一斑而卜全豹，但要由此讀出所得的減少和有效需求的減少這樣不景氣的情形也還是很難的。

續此文，黃印述及「城內業田之戶，多以田歸於佃，可得倍價，故昔之田租，城多於鄉而聚，今則鄉多於城而散也」，在這裡也就是指出農民對土地購買力的增強。我在拙著裡以 A 期田價上昇來作為質疑林說的一個根據，

在這裡應被注目的，不單是田價上漲這件事，就現在可以得的資料來看，其上漲率比米價上漲率還高（參照拙著頁 28，圖 1.3）恰好在一七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之間，田價的昂貴比米價的昂貴還要上揚。雖然要作確實的討論，需要更多數值性資料，但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值得研究，有意思的現象。但若由平均所得減少論的角度來看，如何能夠說明這樣的現象呢？其實這個現象可以算是利率低下的一個表現。有關清代利率的變化，雖然要作數值性研究是困難的，但在乾隆初期的江南，已被指出典當利息甚輕的現象。即如，湯聘「請禁囤當米穀疏」（乾隆十二年）中有「近聞，（各省產米地方）民間典當竟有收當穀米一事。子息甚輕，招來甚眾，囤積甚多」。又對此上奏之浙江布政使的回答中則有「惟是杭、嘉、湖民，以養蠶為事，官糧及一切日用，皆藉此立辦。間遇絲客未至，需要孔亟，向典質銀，價長贖回另售，起息甚微」（日山）。利息這樣的低下，不也正暗示著在當時的江南存在著有農民可以利用的豐沛的貨幣嗎？

二、貨幣量、人口、農業生產量的變化

林氏之論說乃是透過貨幣量、人口、農業生產量的動向來試著說明有汪輝祖所言的所謂「往年專貴在米」的現象。林氏認為 A 期是人口(P)↑ > 貨幣(M)↑ > 農業(Ag)↑ 即人口增加率最大、貨幣增加率次之、農業生產增加率最小。對此，B 期則為 M ↑ > Ag ↑ > P ↑。以下將檢討各個數值性的根據。首先，有關農業生產量因為即使要作數值性的掌握也不可能，希望先將其除外。

（一）關於人口

關於人口。以下這段引文為「汪文」使用的 Liu and Huang 十年成長率資料的計算方法。

“Using Perkins' estimate as an approximation of the long-term trends of China's population, we may interpolate the population totals at ten-year intervals from 1380 to 1950 used in this analysis by assuming that

variations in the unadjusted official figures are reasonably reflective of the true picture”.

問題是有下線的部分。雖然他們在有關長期性的動向上根據 Perkins 的推算，但有關更短期十年間隔的數值，是「假定官方未修正之數值其變動反應出實情的情形下」算出的東西。也就是說，林氏所用的 1730-40 年的千分之四十五，1740-50 年的千分之十九等數值，已在官方數值的激烈變化下被規定住。這期間，官方數值由於人口調查法的變化而激增這一事為周知之事。果真如此，就這樣使用這資料，提出所說以 1775 年作為分界點的有關人口增加率變化等的結論，是值得商榷的吧！從現存有關全國人口資料的精確度來看可以說，要討論所說的有關人口增加率的時期性變化那樣微妙性的問題，說起來是不可能的。

又，林氏雖然述及洪亮吉的人口壓力說不是可以支持 A 期現象的嗎？但是，洪亮吉的人口壓力說是在 1793 年寫的東西。雖然未必能說他的發言能正確的掌握實際人口的動態，但他的發言與其說基於 A 期情況的觀察，不如說基於離發表較近的 B 期的情況較為自然。膽敢加以推測的話，具體的說，他的心目中或許有一七八〇年代全國性飢饉和米價上昇時困乏的情境也說不定。

（二）白銀流入量的問題

若假設要對所說以農業生產量、人口為主作增加率高低比較那樣細緻的作業其資料是不可得，那剩下的就是白銀的流入量的問題，主要問題有 1. 藉由歐美船的進口 2. 日本銀 3. 安南、緬甸銀 4. 由南洋的進口，以下順次試著加以檢討。

1. 藉由歐美船的進口

有關經由歐美船隻進口的白銀在一七四〇年代到五〇年代之間減少之說並不成立一事，在拙著中已經可以論證。當然，從七十年代到世紀末和歐美船之貿易額更加倍增之事，如同周知。但是，貿易額的增加和銀流入量的增加是否有直接的連結，這還有考慮的餘地，由拙著圖 5.8 中讀取的是商品總出口額(A)和商品總進口額(B)之差，到世紀末無寧有縮小的傾向。也就是說，

中國對歐美船的貿易順差趨於縮小，這可以舉在地方貿易 country trade 上入超傾向增大的事例作為要因來說明。因此在拙著圖 5.10 裡，由商品總出口額和商品總進口額的差來推算出白銀的流入量。這主要是考慮到在 Morse 等白銀進口的資料沒有辦法反映經由地方貿易的白銀出口，所以採用這樣的方法。以上可看出經由歐美船隻的白銀進口，從世紀中葉以後持續增加，至世紀末有增加情形停止或有減少的傾向。這是我目前暫時的想法。

林氏關於白銀流入量的變化作如下的論述：「『汪文』頁 316 表七引余捷瓊統計 1752-1800 共輸入 105 百萬元，年平均才 2 百萬元，而由『汪文』頁 303 表四中，1616-1625 年每年流入中國的日本銀有 3,639,210 元，1752-1800 年之銀輸入量反不如 1616-1625 年。『汪文』的基本論調是由明末到 1775 年，據何柄棣、Perkins 等研究，十八世紀中國人口約增 1.5 倍，但銀的成長卻不到此倍數，必然造成 $P \uparrow > M \uparrow$ 的局面」來說。我認為汪文中值得商榷的是有關 1775 年的轉型（由 $P \uparrow > M \uparrow$ 到 $M \uparrow > P \uparrow$ ），由這文章所含的數值來看，沒有辦法論證 1775 年的轉型。又，若能考慮到作為流入銀累積結果的國內銀的流通量，及明末軍事性、財政性的貨幣需要之大等點的話，會更較妥當。

2. 關於日本銀

關於日本銀。林氏談論到的是「『汪文』討論 A 期貨幣成長緩慢，尙非主要依據東印度公司數據，而是當時日本銀供給減少的數據尤為關鍵」。但是，應該考慮到的是日本銀流入的減少非起始於 A 期，1668 年幕府在禁止日本銀出口以後，急劇減少，在十七世紀末時已經只剩下些微了。

3. 安南、緬甸的白銀

有關安南、緬甸的白銀。流入量的推算雖然很難，但將 A 期和 B 期加以比較，沒有辦法被認為可以得出 B 期方面有大量流入的結論，現就可以知道的資料試著加以整理（根據和田氏）。

(1) 1746 年～51 年……，在乾隆十一年，有二～三萬的中國人赴緬甸茂隆廠開採。但是在十六年因為茂隆廠的商人吳尚賢遭清官吏逮捕獄死，茂隆廠衰微，四十二年雖然再開，但其銀產些微。

(2)1760 年代……在趙翼《簷曝雜記》中，有緬甸的大山廠、安南的宋星廠為中國人所開發，並將大量的銀帶回的記載。單是大山廠年間即有一百余萬兩的流入額。

(3)1758 年～67 年……緬甸的大山廠（桂家廠），在乾隆二十三年受到 Alaungpaya 朝的攻擊，而衰微，三十二年清軍通過時，已成為廢墟。

(4)1775 年安南的宋星廠被封鎖。在阮朝之下，1803 年宋星廠再開，但產額少。

以上，根據和田氏的結論，如以下所述。「安南、緬甸的銀礦從乾隆初左右開始，由多數自中國出境的中國人開採，並將鉅額的白銀帶回中國，但不久就因清朝、現地政權的壓迫而完全衰微，這是已經可以明白的。而如前所述，緬甸的茂隆廠於乾隆十六年、桂家廠於同二十三年頃、安南的宋星廠於同四十年，結束其繁榮時期。由這些各個靠中國人開採的礦場的結束來看，中國人開採這些銀礦，將鉅額的白銀帶回中國的期間，最長來計算也不過是由乾隆初到四十年為止的事，可以說都是相當短的時間」。林氏所引用的 Martin 的文章是到十九世紀銀不足時期中國人再度對安南、緬甸白銀關心時期的敘述。基於以上的理由，安南、緬甸銀流入中國最盛期，就以往的研究來看，可以說不是 B 期而是 A 期。

4. 由南洋的進口

有關因南洋（菲律賓等地除外）等地進口之白銀數額未載入拙著圖 5.10，被林氏所認為的疑義。如 186 頁所述，因為有關在菲律賓以外的南洋貿易上之銀流入量是如何？沒有辦法得到確實的證據，所以只好留白。明末的觀察者言：「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所產物相抵」，即使歐美船的地方貿易，對中國來說也不是出超而是入超。

三、A 期是經濟困難的時期嗎？

若將以上加以總結，依據私見一，A 期沒辦法說是「專只有維生物資特別昂貴」的時期，由現在可得的證據來說，不如說是一般物價昂貴的時期來

看較妥。二，人口、貨幣量、農業生產量無論哪一個都是呈現上揚的情形，這是確實的，但是哪一個的上昇率高？這樣細緻的議題，就現在可以得到的資料來看，是沒有辦法解決的，又要將 1775 年作為分界點來討論上昇率順序的變動等之論證，也是還沒有辦法的。在 A 期確實可以強烈的感覺到糧食的不足，當時的人們將其歸咎到人口的增加，作為其中的一個原因，這也是自然的事。但是這種糧荒是經常伴隨好景氣而起的一個現象，這不也和同時期的英國等有相同的情形嗎？雖然或許可以說「A 期是有供求關係強烈緊張性的時期，B 期是稍稍被緩和的時期」，但若要用「A 期是經濟困難的蕭條時期，B 期是經濟繁榮的景氣時期」這樣的方式來清楚地區分的話，是沒辦法的。

以上雖然是我對林說的意見，但我沒有辦法贊成林說的根本理由，更率直一點可以說（雖然要論證是困難的）有如下的幾點：

第一，如林氏所說的「A 期因銀少導致長期貿易不發達」，這個時期若是假設銀不足而阻礙長距離交易的話，「銀荒」的議論應該可以廣泛的看到。在明末也好或是康熙末年的海禁時期也是，人們敏感的察知「銀荒」，而有熱烈的討論。「銀荒」對他們來說是解釋經濟困難很習慣的邏輯或想法。儘管如此，但在 A 期卻幾乎沒有辦法發現有關「銀荒」的議論。林氏所引用黃印「今之專用錢者，由銀之留於下者少，而非以錢足也」，來旁證 A 期銀不足說，按我的看法，黃印所說是他為了說明「錢被多用而且錢價高」這不可思議的現象而想出較為勉強的議論。如果黃印認為錢↓<銀↓的話，那沒有辦法說明錢價的昂貴。相反的，錢↓>銀↓的話，不是和「汪文」的主張恰好相反嗎？

對人口動向與數十年以上長期物價的關係，我想採取保留的態度。當然就短期的變動來說，人口和物價的關係十分明顯，比如鄉試、會試等導致人們流入都市而引起食糧價格昂貴等情形。但這種短期的情形姑且不論，就長期動向來說，用人口增加來說明糧食上漲的方法，恐怕有失其妥當性。雖然這也可以說是我二十年來從研究中得到的一種經驗性感覺，以下大膽的試著加以說明。整體而言，既然有一定數目的人口存在，就一定存在有養活這些

人口的糧食。如果糧食比人口絕對不足的話，長期的人口增加是不可能的。當然，對於那些生存水準緊俏或水準以下的貧困層來說，是有強烈的糧食需求。但是，促使那需求押升價格的條件，不是在於需要的強度，而是在於有多少的有效需求。沒有貨幣想要買糧食也買不到。因此，就我的觀點，決定長期性物價動向的，主要要因在於貨幣。不只是當時的人們，研究者也是往往就短期性的供需關係和其類比來說明長期性物價動向。但是，我覺得這應該再考慮一下。雖然可以用全漢昇氏所論，用人口增加→邊際地耕作→生產成本的增大來說明。但是，在當時地主、商人掌握的流通經濟裡面，生產成本真能反映價格到什麼程度？對我來說，是個疑問。

最後，在林氏論點中，以上沒有觸及到的點，接下來簡單地說明一下。

(1)拙著 354 頁蘇州貨幣使用之圖表中，在 1773-93 時增加的，除銅錢之外，是「七折錢」，不是「銀元」。

(2)有關戶部銀庫積存銀數，百瀨的數值是由魏源《聖武記》中所取出。魏源這些數值中有關康熙、雍正部分是從阿桂的上奏文中所取，雖然無論哪一個數值，包括我自己所製作的戶部銀庫積存銀數圖表，都有若干的偏差，但像在拙著中 489-90 頁中已觸及的那樣。敝人所使用的是較一手的史料，比較沒有疑問，所以使用此資料。即使在一年之內，戶部銀庫的儲藏額有變動，或許誤差由其變動而來也不一定。但是，就長期性統計，利用在一定的奏銷期間所報告的數值，應較為妥當吧！又林氏所舉乾隆盈餘七千八百萬的數字，雖然是根據魏源在乾隆四十六年時所報告的，但這也可以說和拙著圖 13.1 的 1780 年的數值幾乎是一致的。又繼續林氏對此的指稱「『汪文』B 期顯著較 A 期存銀數多，而 A 期又較康、雍之際稍降，似乎也印證『汪文』的立論」。這似乎是基於戶部銀庫的銀額反映出民間銀的流通量這一前提所作的考慮。但是相反的，民間的白銀被戶部銀庫吸入累積的結果，使得民間的銀的流通量減少，這樣關係的假定也有可能。應該採用哪一種，不得不根據綜合性的勘察吧！

以上就林教授對拙著極為懇切的批評，試著略述己粗淺的私見，希望由此對話作為發端，藉著乾隆年間經濟史的研究，能讓彼此有更深刻的相互理

解，這是我所期盼的。

参考書目

則松彰文，〈清代中期における江南流行衣料について〉《和田博徳教授古稀記念明清時代の法と社會》，汲古書院，1993。

稻田清一，〈清代江南の世相と士風〉，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

日山美紀，〈清代典當業の利子率に関する－考察〉《東方學》91期，1996。

和田博徳，〈清代のヴェトナム・ビルマ銀〉《史學》33卷3,4號，1961。